
环境史视野下近代重庆城市 灾害及其社会应对

周志强¹

（西南大学西南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 自 1891 年重庆正式开埠以来，重庆的近代化进程开始加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城市面积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城市近代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城市本身的微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灾害对城市环境面貌有着直接显著的影响。重庆近代化进程中，重庆的城市火灾、兵灾、水旱灾害等城市灾害频繁发生。其危害性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对城市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开埠以来重庆城市灾害对重庆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社会应对作一探讨。

【关键词】 灾害 城市环境 近代 重庆 社会应对

【中图分类号】 X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40 (2017) 06-009-07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其除了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容小视。特别是城市，由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受到的损失更为严重，相关的学术成果也相当丰富。但多为对古代都城的考察，具体对近代城市灾害与城市环境的关系考察还较少^①，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具体考察近代重庆频发的水旱灾害、火灾、兵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及其社会应对措施，以期对现代化城市建设有所启示。

重庆凭借其“三江总汇，水陆冲衢，商贾云集”的优越地理位置，一直以来都是长江中上游的军事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自 1891 年正式开埠以后，重庆的对外贸易获得快速发展。近代工业体系越来越健全，尤其是抗战的工业大内迁，各个产业部门纷纷向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大后方转移。至 1940 年，重庆已有各类工厂 429 家。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多。全面抗战以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大量军政人员、工人、高校以及平民来到重庆，“重庆人口剧增，1937 年约 47 万，1938 年即达 60 余万，1941 年突破 70 万，1943 年接近 90 万，至 1945 年初已逾百万”^②。1891 年到 1949 年是重庆向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开始走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道路。

同时人口的急剧增长，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的环境问题，当时重庆“人烟稠密，空气恶劣”，城市环境状况很差。而这其中城市灾害也是影响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密切及自然对人类社会影响及其自身作用的凸显，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与生物界、非生物界的关联性正从不同侧面凸显”^③。易受灾害冲击影响、破坏的绝不仅仅是人，生态环境也在这些灾害中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日益频发的城市灾害

（一）水旱灾害

作者简介：周志强（1993—），男，安徽巢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环境史，食物史。

重庆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的不稳定性使重庆的水旱灾害频发。旱灾使土地龟裂,植被大量死亡,田地不能耕种,洪水使农田被淹没,房屋被冲垮,其对乡村的农田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影响。而不仅仅是对乡村生态系统有着直接的破坏作用,对城市生态的破坏也不可小视。

近代重庆的水旱灾害十分频繁,1912-1915 连续四年大旱,人以草根树皮为食,农村甚至出现十室九空的现象,1925 年,重庆范围内旱灾面积广,巴县、奉节等数十个县受灾。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 1936-1937 的大旱灾,重庆市及附近的几个县灾情之重,范围之广,为近百年所罕。自秋冬至当年春夏连月不雨亢阳,无法播种甚至连饮水都成为问题。“巴县八十余乡镇重灾区域达十之八九,田土收获平均仅及十之一二,赤地千里,十室九空,草根树皮早已掘食尽,因争掘白泥以致倾伤者亦有数次”^[3]。

重庆市降雨多集中在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降水的集中,以及近代城市排水设施的落后,使得城市水灾也十分频繁。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统计,自 1891 年以来仅重庆主城区发生的水灾就达数十次,比如在 1905 年七月,川西和川东南连降大暴雨,重庆沿江房屋被水淹没,死亡上千人,江津,七月十一日大水,长江涨水,王爷庙六步石梯被淹降水流过龙门街上,1912 年重庆大水,渝埠下街致成泽国;1915,六月江津雷雨电一夜,永兴场淹大半,房屋淹倒无数;1917 年 7 月底河水暴涨,淹上千厮门、镇江寺、朝天门,城外民房被水打去不少,1919 年 5 月“大雨倾盆,各街水深几尺,河水高涨丈余,淹没庐舍人畜”,冲毁大量房屋,人畜尸体漂流;1919 年 7 月重庆发生大水灾,涪江流域沿岸淹毙 1000 余人;1931 年自四月到八月上旬,各地连降大雨,长江、嘉陵江水势暴涨,重庆沿江贫民,小商小贩流离失所;1938 年 5 月 26 日,大雨如注,下城各街巷水深二尺(0.67 米),1945 年七月,江水大涨珊瑚坝全被淹没,民房被摧毁甚大;1946 年 8 月,嘉陵江暴涨,沿江淹没船只人畜不计其数,1949 年夏秋沿河波涛汹涌,冲毁人畜房屋,沿江工矿码头被破坏严重,低矮地段茅屋荡然无存。

水旱灾害本身对于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作用,更严重的是由于其引发的难民问题对城市环境有着更为巨大的影响,大量灾民涌向城市,使重庆形成庞大的难民聚居地,使重庆的社会生活、城市环境都面临着巨大考验。

(二)火灾

除了大量自然灾害,还有很多人为的城市灾害频繁爆发。比如火灾,一直以来重庆就是一个火灾易发的城市,“重庆素苦二患,一曰火灾时发,二曰饮水不洁”^[4]。《九年来之重庆市政》就记载“计自民国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二十年六月止为时随仅半载,而被灾次数已有十三次”^[5],可见重庆火灾之严重。重庆火灾频发,首先是气候因素所导致。重庆素有“火炉”之称,夏天气温很高,伏秋又多旱,极易引发火灾;其次在重庆近代化过程中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重庆的人口密度迅速增加,“重庆城厢三四十万人口,仅以高低斜曲之十三四方里积容之”^[5],城市人口众多,空间拥挤。很多贫困的无产者,其住所多为以竹席竹架搭建的临时住宅,正如当时记载“本市旧街狭隘,既如上述而烟户鳞次栉比,尤为稠密,火警易生,蔓延极广,且每于灾后搭盖临时捆绑房屋次序凌乱倒塌堪舆”^[5],这样的棚户密布于城市之内,极易发生火灾。城内“除夫子池、莲花池两污塘外,无一水池”^[5]。市内像公园、广场之类的公共建筑也极少,火灾一旦发生就会迅速蔓延,极难扑灭,绵延大半个城市的情况屡见不鲜。

1912 年 7 月 31 日,“重庆市区发生特大火灾,全城房屋焚烧达五分之一,公私财产损失达 100 万左右”^[6];1920 年 2 月 10 日,重庆市区较场口一带又发生火灾。“傍晚大火从荒货街烧起延及百子巷、走马街、黄土坡十八梯、木货街、演武厅、瓷器街等处,直到次日凌晨才熄灭,烧毁民房数千家”^[7]。1924 年 8 月 26 日,重庆市区突发特大火灾,由于汲水困难,扑救无力,“自 26 日起火,延烧 4 昼夜,到 29 日方熄灭。此次大火焚毁商店民宅 2000 余家,经济损失 1000 万以上”^[7]。1930 年 8 月 25 日,重庆市储奇门河街一带发生大火灾,从早上 9 点过烧到半夜,前后延烧 8 个多小时。火起于储奇门外,延烧入城,遍及仁和湾、双巷子、金紫门瓷器街等地,灾区广袤三四里,受灾商民逾万户 116,是重庆前所未有的特大火灾。另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建国前夕所发生的“九二”特大火灾,1949 年 9 月,重庆天气炎热干燥,9 月 2 日重庆城区爆发了一场大型火灾,据时人回忆“下午 3 时 40 分左右,下半城赣江街 17 号协和街油蜡铺不慎失火。火势迅猛蔓延,东水门到朝天门,陕西街到千厮门一带染成火海,大火至次日晨方熄灭”^[7]。“并且大火还借风势向临江的棚户区蔓延,它的延烧范围包括整个朝天门到小十字这个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口的三角洲地带,很多街道被全部焚毁”^[8],造成巨大损失。在人身伤亡方面,仅官方公布掩埋的尸首就达五千多具。据灾后统计,“大火过灾面

积 41 万平方米,共烧毁大小街巷 39 条,受灾 9601 户共 41425 人,有户籍可查的死者 2568 人,掩埋尸体 2874 具,伤 4000 人,物质损失难以计数”^[9]。

除了人为疏忽和气候干燥所引起的火灾之外,还有些火灾完全是由战争所引起的。在近代四川地区军阀混战期间,重庆城区多次遭到人为的焚毁。对重庆城市影响最大应该是 1937-1945 日本对重庆进行大规模轰炸所引起的火灾。在对重庆的大轰炸中,日军不仅仅投放了大量炸弹,还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其中一种 98 式燃烧弹重 60 公斤,内填有固体燃烧剂,这种燃烧弹甚至能使水泥钢筋,更不用说密布于城内的棚户了。“投下来的燃烧弹所引发的不再是几个火头,而是同时几十个火头,其范围所及不再是一角一隅,而是整个的商业区”^[10]。在大轰炸中重庆城区成为一片火海。据《重庆市消防人员殉难纪念碑》记载:七七事变后,倭寇肆虐轰炸,对全市空袭 96 次、296 处火场^[11]。可见战争对重庆火灾的发生影响之大。

(三) 兵灾

自古以来,战争就给人类社会带来沉重的灾难。不仅是大量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自然和资源也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牺牲品。战争中双方对各种资源的消耗都不惜代价;在战争中为了围剿对手,放火焚山的策略被频繁使用。战乱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战乱地区的生态面貌伴随着战争的深入发生着急剧的恶化。自近代以来战争的破坏作用更是越来越显著,尤其是城市一旦遭受战火的洗劫,对城市生态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鸦片战争以后,重庆地区就发生了很多战争,包括围剿太平天国的战争,针对英法美等国的宗教侵入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洋教的斗争等等。而对重庆影响最大的还是辛亥革命以后在重庆军阀之间的混战,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对重庆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国民政府正式控制重庆以前,重庆军阀派系众多,“川中将领各拥防区,重庆为通商巨埠尤防区之富者一有冲突不能无争”^[4]。重庆遭到了川军、滇军、黔军等军阀派系的一系列争夺。1920 年川滇黔军阀混战,驻合川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派兵偷袭重庆,与驻重庆黔军激战数日。随后,由重庆撤出的滇黔军又在南岸真武山上用大炮轰击城内。频繁的战争使重庆遭到严重的战争创伤,而且“杨森、赵荣华、熊克武刘湘、袁祖铭等人相继占据重庆。这些军阀极尽搜刮之才能,对城市的经营管理无暇顾及”^[12],对城市环境的改善更是无从谈起。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环境是极其恶劣的。

经过一系列的兼并,1926 年以后重庆一直由刘湘所占据,城市建设开始有一个相对好的外部环境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本出于让国民政府快速投降的目的,对重庆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战略,对重庆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在一些记录的片段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重庆破坏情况之严重,“从十九日一点三十五分到二十日十四点连续四次轰炸,商业区西部郊区及江北的广大范围遭到轰炸,有三十八处冒烟,烧毁房屋和商店二千间以上,巴县县城仅存五分之一,重庆市街已面目全非”^[13],根据相关的研究“重庆大轰炸从 1938 年 2 月到 1943 年 8 月历时五年半,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共出动飞机 9513 架次,实施轰炸 218 次,投弹 21593 次,炸死市民 11889 人,炸伤 14100 人,炸毁房屋 17608 幢”^[14]。日机的轰炸使大量房屋化为焦土,使整个城市成为废墟。城市秩序也陷入混乱,严重破坏了城市的生态环境。

二、愈益恶化的城市环境

这些城市灾害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近代重庆城市生态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战争除了直接摧毁了大量的建筑物,产生大量城市垃圾以外,还使大量资源消耗。比如城市周围的林木资源,人为的放火焚林以及由战争引发的森林火灾都使森林大量减少。另外火灾和战争使大量建筑物直接受损,临时搭建的房屋需要大量的竹木资源,这也使重庆周围的森林资源被迅速消耗,加剧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战争与火灾还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气污染。另外战争还破坏了城市的正常运转,使重庆的公共服务体系直接瘫痪。比如城市的粪便问题,大轰炸之前城市的粪便每日都有专门的挑粪公运出城外乡村以作肥料。而在大轰炸之后,大量厕所炸毁,大量城市粪便由于粪夫离散无人收拾,“在社会新陈代谢中形成无法修复的断裂,一种生命本身所要求的新陈代谢”^[15],城市产生的废物无法排入到外部环境,粪坑满溢,城市的市容卫生受到严重污染。这种城市“新陈代谢”的中断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生态环境,使重庆成为遐迩闻名的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的三多城市^[16],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其不仅对城市环境造成了一系列直接的破坏,而且由于战争中大量的军费开支,投入到改善城市环境的市政建设更是微乎其微。据夏明方统计,北洋军阀时期军费支出达到 39%,十年内战时期达到 43.84%,抗日战争时期更是达到 85.86%^[17],使政府的经济建设费用仅在 5%左右,用于改善城市环境的费用更是微乎其微了。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战争成为人们政治、经济甚至日常生活的中心,使人们更加无暇顾及到城市的生态环境。

水旱灾害也对城市环境有严重的破坏作用。水旱灾害不仅仅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也有巨大的影响,对城市生态的直接破坏十分严重。比如水灾很容易引起类似山洪爆发这样的次生灾害,在 1941 年九月重庆连降大雨导致“山洪暴发,临江门畔崩裂,压倒房屋百余间,死伤颇多”,摧毁房屋,毁坏土地,使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旱灾同样对城市生态产生巨大影响,如 1936-1937 年影响整个四川地区的大旱灾,重庆也是受灾十分严重的地区。四川很多地区从 1936 年 6 月起就很少下雨,重庆以下的长江主航道甚至都被迫断航。这次旱灾使农业大规模歉收,收获的粮食还不够下一年的种子。食物的严重短缺使这些灾民想法设法寻求食物,逃离农村去往城市是他们一个重要的自救措施。他们“趋集都市以求最低限度之温饱”,当时各地逃来重庆的灾民不绝于途。正如贝克在考察川灾时看到的“至重庆时,始知该市已有附近逃来之灾民一万八千余人,此项灾民在本人到达之前一周已饿死八百余人”^[18]城市人口剧增,而且这些人多为难民,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城里树木草皮就成为他们盯上的又一食物来源“灾情紧急时灾民蜂拥入城内,争剥梧桐树皮,公园先被剥尽然后直入民家”、“芭蕉挖食殆尽”^[19]使城里的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类似的报道不绝如缕。

难民的涌入对城市卫生也带来重大挑战。“渝市各小巷饿殍横卧,遗弃之灾童,奄奄待毙,饿死者因掩埋费太多,只用席卷好便埋”^[20]大量灾民仅仅依靠着粥厂每日的接济度日,生活得不到保障,很多人都露死街头。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受到巨大挑战。据统计 1、2 月重庆街头冻饿死灾民达 2870 人⁷。甚至由于死亡人数太多还“在重庆对河北县郊外修火葬场,采用火化方法,以求省便”^[21]。

这些灾害还极易衍生出霍乱、疟疾这些次生灾害,又恶化了城市的微环境。伴随着近代重庆城市人口的集中,人口流动的频繁使得疾疫很容易在城市内爆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灾害使民众流离失所,食物的严重匮乏使居民身体极度虚弱,这些灾害使居民的生活更加不稳定,无疑加剧了这些传染病在重庆的流行;而且由于这些灾害城市公共卫生环境恶化,很多人都只是卷着草席卧于街边,大量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大量尸体也得不到及时的处理,“有的已开始腐败流水,如果迎面风生,臭气令人欲呕”^[22]。这样的城市环境无疑会使疾疫大规模的爆发。

通过资料可以发现,重庆城内的疾疫爆发除了由于人口流动,从外地传入以外,灾害与传染病的流行有着直接的联系。比如在 1920 年水旱灾害后,“西南很多地区都发生了疫灾,其中重庆患霍乱及软脚病死者达万余人”^[23],1921 年“重庆城区霍乱流行共死亡 6934 人”¹⁷战后也是传染病的高发期,正如上文所说,战争使城市正常运行机制完全失调,城市卫生严重污染。从 1937 年开始的大轰炸,不仅造成直接的伤亡,还使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性脑炎等相当流行,又造成大批市民间接致死。在 1939 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曾发生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就因痢疾流行导致数十人死亡。一个月之后,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死亡达 200 多人。城市的恶化导致城市传染病频繁的爆发,而城市疾疫的流行也进一步恶化了城市人居生态。

三、对城市环境改善的努力

灾害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城市运转,尤其是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但灾害对城市既有破坏性也有建设性的一面,近代重庆人也越来越认识到了城市环境的恶化,除了在灾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临时赈济以外,政府对由灾害引发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生态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市政建设。面对重庆火灾频发的问题。在火灾防治上,重庆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在光绪时期重庆就有由地方绅士组成的水会工所专门负责扑灭城市火灾,近代以来重庆市政府也组建了专业的消防队伍。不仅如此,重庆市政还将宋代在火灾中修建防火巷的经验借鉴过来,通过开辟火巷改善市内建筑密集的状况,以防止火灾的蔓延,规定“沿街铺房及临街楼廊一律折退与门柱平齐”兴建房屋时一律比照退让,应留火巷之处,即禁止再造,城区以内,不准建搭捆绑房屋。

火巷的辟极大的增强了其抵御火灾的能力,减少了由于空袭带来的损失,同时改变了城市内部拥挤不堪的状况。另外,开拓马路也是防治火灾的重要措施,很多火灾由于道路不通而无法进行救援,比如1938年临江门火灾“虽经消防各队努力施救,但以马路未通,摩托水龙不能到达,以致延烧甚广”^[24]。为了能够迅速处理火情还新建并拓宽了多条市内马路。同时政府也认识到重庆“水质淤浊,汲运不便,而户口日繁,一遇火警,取水艰难,蔓延至广,对于消防关系尤重,舍创办自来水厂别无它途,重庆自来水公司于1927年开始筹备,于1933年正式开通自来水,并在在市内多处设置水龙。另外组建专业的消防队伍,通过迁坟整理滩地以扩大市区面积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不仅极大的减轻了火灾对城市的威胁,而且使旧城拥挤的状况得到缓解,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

近代重庆“街巷迫窄,地价极高,无隙地以种花木”。一直以来城内绿化面积都很少,在二十年代人们就认识到“本市人烟稠密,空气恶劣,市民业余之暇,苦无游憩场所,建筑公园实关要图。”公园的修建不仅能够给城市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善城市的局部环境。近代重庆修建的第一个有公共性质的公园是中央公园,中央公园位于重庆的上下城之间的后伺坡。于1921年杨森任督办时开始建造,但中途由于战争等因素一度中断,1926继任市长潘文华在原有基础上完成,于1929年8月正式完工并命名为中央公园。据巴县志记载,“全园面积无虑一千余方丈,杂时花木,兼蓄鸟兽,”院内还有网球场、图书馆、阅览室、儿童游乐场等一系列公共设施。另外还有卢作孚修建的北碚公园,1929年卢作孚令拆火焰山东狱庙神像建成博物馆同时将周围林地、荒坡坟山及部分农地60余亩辟为火焰山公园,1935年改为北碚平民公园。1945年与北碚动物园合并定为北碚公园。政府还规定在“不适于人民住居者禁止再建房屋以作栽植树木造成风景林之用”。除了修建城市公园外,还在政府附近街道和市区的主要街道栽植大量行道树,以美化环境。“1939年3月,成立了重庆市各界造林运动委员会,是年在市内植树数千株”^[25]。城市绿化的发展不仅极大的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并且在火灾发生时还能够阻止火灾的继续蔓延,给灾民一个临时避难的场所。

政府对于城市的环境卫生十分重视。在《陪都十年建设草案》中就将改善环境卫生作为计划的要点之一。早在重庆正式建市之前就组建了专业的清洁队伍,负责清扫街道收运垃圾,到“1929年重庆正式设市时,清道夫增至206人,抗日战争时期,清道夫增加到2000余人”^[26],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如重庆商埠整齐街面暂行办法、重庆市清洁取缔办法、整理市容初步办法等通过法律法规要求市民注重街道以及房屋周围的清洁,以改善城市环境卫生。针对重庆疫病频发的情况,政府也十分注重防疫防控,增强医防设施,推广卫生教育,积极研发疫苗,如为市民免费接种疫苗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在市内筹办多个救济所等等。针对“重庆城内时有淤塞,雨时则溢流街面者有之,积滞成河者有之”的情况,在市内修建疏浚下水道,在《陪都十年建设草案》中根据重庆的实际,设计了一系列改善方案。其他如大型公共体育场、剧院、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的修建等都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以及居民的生活环境。政府职能对于环境的规划和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说政府的这一系列市政建设由于在战争等特殊背景下其实质效果有限,但它是对重庆步入近代化过程中改善城市环境的有益尝试,值得我们今天去借鉴。

除了在市政建设方面对城市环境进行改善,政府还积极促进居民的环保卫生观念的加强。面对严峻的城市环境问题,政府自身不仅通过一系列市政建设以改善城市环境。在1934年政府还发起新生活运动,号召群众一起来改善城市环境,加强全民防灾意识,提高市民的卫生观念以及防范灾害发生。新生活运动,又称民族健康运动会,1934年由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1935年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会在重庆市成立,并创办了《新生活半月刊》来宣传卫生健康观念。1935年7月,省新运会与市公安局对重庆市清洁问题作出规定:各街市民每户每院限一星期内依样式制垃圾箱一个;各街正酌雇扫除夫役,限期拆卸各街巷凉棚,整理各街垃圾箱,责成清道夫随时清运,搞好市街卫生。1937年后省新运会迁到重庆的七年中,重庆每年都要举行全市清洁大扫除,并下令开展卫生运动,重庆市内不和卫生,新运会应即协同青年团、市政府、警察局等发起清洁运动,实行市区大扫除并规定1944年为陪都整洁年,令警察、卫生两局就市区环境卫生切实予以整顿制定各级新生活运动。推进精神动员,提倡正常娱乐活动、疏散人口运动、体育健康运动、公共卫生运动,创设新运模范区。虽然民间对新生活运动有类似“实行新生活,出门背痰盒,实行新生活,礼义廉耻挂嘴角”^[27]的调侃,其带有浓重的政治意味,但不可否认他对近代重庆人民的卫生观念的改变起了巨大的作用,对重庆卫生的近代化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政府之外,大量上层士绅对新型城市化进行了有益尝试。卢作孚在北碚进行的新型城市化不仅在当时产生积极反响,同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北碚原来只是一个仅有两条主要街道,面积仅为0.198平方公里,街道狭窄凌乱污秽的小乡镇,1927年卢作孚开

始在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卢作孚以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城市环境创造一个美观实用的城市空间为目标来建设北碚。重视人才的培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的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邀请文化名人来到重庆。还在 1927 年修建北温泉公园,修建公园和街心花坛扩大城市绿化。创办地方医院免费为市民打防疫针,协助订立清洁卫生公约,发起灭鼠灭蝇运动在嘉陵江边设饮水消毒站。卢作孚对北碚的新型城市化建设使北碚从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干净整洁卫生的现代化新兴城市。在当时,北碚的建设模式对周边地区甚至重庆主城区的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四、余论

正如李文海先生曾强调的:“灾荒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二者既是因,又是果,因即是果,果即是因,因果循环往复不已”^[28]。这在重庆的近代化进程中表现的尤其明显。重庆自 1891 年正式开埠以来近代化获得快速发展,但这种近代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政府的不合理开发,以及缺乏合理的城市规划规划,各种城市灾害在近代重庆频繁发生。而相较于明清以前的城市灾害,其危害性也更大,除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以外,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加不容小视。“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影响”^[29]是十分有必要的,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周勇. 重庆通史[M]. 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 2014:469.

[2]周琼. 定义、对象与案例:环境史基础问题在探讨[J]. 云南社会科学, 2015(3):92.

[3]马力.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M]. 北京:气象出版社, 2008:46.

[4]朱之洪等修, 向楚等纂. 民国巴县志. 成都:巴蜀书, 1992:538、621、541、542.

[5]九年来之重庆市政,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联合翻印, 第 90、7、57、6、57、61、54、57、6.

[6]重庆市志·大事记[M]第一卷.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61、80、92.

[7]许世和. 重庆“九二火灾”纪实, 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M]第 2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83.

[8]罗世麒等. 反动派九二放火大烧重庆城,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M]18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79:129.

[9]王小全, 张丁编. 老重庆影像志:老档案[M]. 重庆出版社, 2013:166.

[10]大公报[N]. 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张.

[11]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重庆市志·大事记[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222.

[12]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1991:592.

[13]小林文男. 抗战中苦难的重庆,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 30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82.

[14]王川平. 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1:90.

[15]杰森·摩尔. 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一部环境史——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载夏明方. 新史学:历史学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第 6 卷)[M]. 北京:中华书局, 2012:26.

[16]重庆市志·卫生志[M].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398、81.

[17]夏明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377.

[18]申报[N].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昨晚川灾救济协会欢迎贝克.

[19]大公报[N].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范长江. 川灾勘察记(五).

[20]曹仲植电文. 转引自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M]. 北京:气象出版社, 2008:7.

[21]大公报[N].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一日. 范长江. 川灾勘察记(十).

[22]文摘[N]. 1937 年第二卷第一期, 第 92 页.

[23]川滇黔军阀混战中四川人民的灾难. 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220.

[24]四川省政府公报[N]. 公牒, 1938 年第 117 期, 第 23 页.

[25]周勇. 重庆抗战史 1931-1945[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461.

[26]重庆市志·环境保护志[M].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758.

[27]陈兰荪、孔祥云.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兴亡史,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0:221.

[28]李文海. 近代灾荒的历史启示. 李文海自选集[M]. 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5:363.

[29]梅雪芹. 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的关联[J]. 世界历史, 2004(3):20.

注释:

1 关于城市环境史研究已有相当成果积累, 孙冬虎在《北京近两千年环境变迁》中, 对北京地区两千年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描述, 其中对近代城市灾害对北京环境的影响也有所涉及。王振忠在《近 600 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中对福州的自然灾害及其对福州社会的影响作了相关研究。尹钧科、吴文涛、于德源在《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对北京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进行了一定的统计与分析。程遂营在《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对唐宋开封城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演变作了分析。相关论文:李

建党在《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一文中具体分析了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商代都城迁移的影响。仇立慧《黄河中游都市发展迁移与环境变化》分析了黄河中游地区环境演变与都城发展之间的关系。赵良宇,《近代徐州城市灾害与政府应对》从城市灾害与应对的角度探讨了近代徐州的城市灾害问题。方秋梅《近代武汉市政与城市环境变迁研究刍议》则以城市环境史的视角对近代城市市政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讨,对本文有很大启发。